

首位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西方记者是谁



1938年4月,毛泽东与博斯哈德、斯蒂尔(右一)合影。

阿契包德·斯蒂尔是20世纪30至40年代活跃在中国的著名西方记者。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1938年和1946年先后两次访问延安,并采访了毛泽东,其中第二次采访谈话还收录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斯蒂尔在1937年12月15日发出了一篇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公开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

不惧危险逆着人流前往南京

斯蒂尔1903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后随父母移居美国,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先后在美联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多家美国新闻机构任驻华记者,亲身见证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七七事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后迅速向南京进犯。12月1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正当南京情势危急之际,斯蒂尔却本着不惧危险的职业精神,从济南出发,先抵达徐州,然后逆着奔逃的人流于12月2日来到南京。

斯蒂尔一到南京就冒险深入火线采访,用报道记录下了惨烈的战况:日军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和机枪扫射让“数以百计血肉模糊、肢体破碎的人被送进医院,将其他残缺不全、失去生命的躯体奇形怪状地散落在弹坑四周”。12月12日至13日凌晨,他仍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城市街区,与中国士兵并肩战斗,遇到日机投弹时“从汽车里出来,靠近墙壁卧倒”。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同时,还进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切断南京与外界所有邮政、电讯联系,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新闻记

者进出。而且让日本新闻媒体散播“南京一片祥和”的谎言,拍摄所谓“日中亲善”的照片,企图用欺骗性宣传粉饰太平、否认罪行。斯蒂尔与德丁、门肯、麦克丹尼尔、史密斯5位坚守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目击者、见证者和报道者。他们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淫掠反人类暴行,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用客观的新闻报道记录日寇的滔天罪行。

最早发出南京大屠杀报道

12月15日,经过与日军交涉,斯蒂尔和德丁、门肯获准乘坐美国军舰“瓦胡”号,从长江水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从南京城内到城外江边的路上,他们看到日军正在大肆屠杀中国战俘和平民,并看到成堆的中国人尸体。斯蒂尔登上“瓦胡”号后立即写稿,并用“非凡的社交能力”说服军舰上的无线电报务员,抢先用舰上电讯设备把报道发回美国。

《芝加哥每日新闻》收到后,于当地时间的12月15日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通讯《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日军杀人盈万》,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是中外新闻媒体中第一次出现“南京大屠杀”一词。因此,斯蒂尔也就成为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和“南京大屠杀”一词的提出者。

通讯开头就发出感叹:“‘地狱般的四天’——只有这句话,才能确切地形容南京遭到围攻和占领时的惨状。”他接着写道:“我们离开这座城市时,最后看到的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江堤附近被有计划地处决,此前这里的尸体已堆积到齐膝深。这是过去几天南京惨状的典型写照。”“接踵而至的日本占领军造成数以万计的生灵,其中许多都是无辜老百姓遭屠杀的恐怖统治的过程。”他用“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形容日军的暴行,并记

录:“城里所有街道上都遍布着平民百姓的尸体。”

由于斯蒂尔兼任《太阳报》和《每日邮报》两家报社的记者,所以这篇报道也同时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只是分别对标题作了改动,《太阳报》的标题为《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残酷的大屠杀》,《每日邮报》的标题是《目击三百人被处死》。12月16日,《纽约时报》转载了这篇报道的节略内容;12月18日,美国《世界日报》以《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掠夺》为题,《旧金山纪事报》以《记者描述了南京的混乱》为题,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第一时间向外界传递了南京沦陷后的真实境况,让国际社会知晓侵华日军的疯狂和罪恶。全世界正义的人们为中国人民的苦难流下同情之泪,对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

此后,斯蒂尔又写了多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并且发表了他亲自拍摄的大屠杀现场照片,深入揭露日军罪行。《芝加哥每日新闻》对其勇敢的采访与迅速、及时的报道大加赞赏,多次在“编者按”中予以赞扬,指出:斯蒂尔是向世界报道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是“了不起的战争记者”;称他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海外报道史上,“是伟大的报道”。

向外传递南京大屠杀铁证

12月15日,斯蒂尔等西方记者离开前,许多仍坚守在南京的国际人士把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文件等交给了他们,请他们将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传播到外面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将一封有关日军占领南京后所犯暴行的备忘录交给斯蒂尔,斯蒂尔将该备忘录交给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后来,该备忘录以附件形式分别出现在1937年12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北平办事处书记官毕达在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和1938年1月5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后者在东京审判中被采纳为证据。

在得知记者们将离开南京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

会成员、金陵大学鼓楼医院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立即把几十页的日记等材料塞进信封,让斯蒂尔带走,到上海后向国际社会公布,让全世界看到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真相。东京审判时,威尔逊和贝德士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斯蒂尔带出去的这些日记、备忘录都成为法庭给战犯定罪的铁证。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拍下的“马吉影片”,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影像,也是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给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元凶定罪的铁证。1938年3月,“马吉影片”在汉口进行了小范围的放映,斯蒂尔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上以《电影描述对受害者的残忍》为题进行了报道,介绍了影片的主要内容,如鼓楼医院救治妇女儿童,被日军砍伤、烧伤的中国人等,他记录下:“许多镜头描述了可怜平民沦为无纪律、残忍、性欲强烈的征服者的牺牲品……最惨不忍睹的一个镜头显示了一个家庭全家被屠杀,躺在他们被发现的地方,女性的尸体被损毁。”在报道最后,又坚定表示:“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它只确认了目击者对日本征服中国最黑暗一页的描述。”斯蒂尔的报道让“马吉影片”在世界更广的范围进一步传播、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对于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逆流,1987年9月4日,年逾八旬的斯蒂尔在接受日本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采访时坚定地说:“很遗憾,我听说有些人不相信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但是确实发生过此事。”展示了这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第一人对正义和良知的维护与坚守。

钱国宏
来源:人民政协报



斯蒂尔

邹韬奋办刊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为了把《生活》周刊办成“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邹韬奋奉行“替人民说话,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的办刊宗旨,主张对黑暗势力予以迎头痛击。他在回答读者提问时,说:“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30年10月,国民党军阀、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上海为他母亲做寿,花费达10多万元,极尽奢侈。对此,邹韬奋秉笔直书,写了题为《民穷财尽的阔人做寿》一文,以犀利的笔锋,斥责了陈调元。很快,不可一世的陈调元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

1931年8月,邹韬奋拆阅读者来信时,发现了一则新闻线索:国民党交通部长兼厦大大学校长王伯群利用权势,以数万元聘金纳该校大学生为妾,并以贪污所得,花50万元巨款建私宅藏娇。邹韬奋极为气愤,前往实地探查,掌握了全部事实,提笔写了一篇很长的编者按,拟与这封读者来信一并编进“信箱”栏目,公布于众。

稿子正在排印时,王伯群闻知此事,急忙派两名心腹携10万元巨款到《生活》周刊社慰问。邹韬奋一眼识破了王伯群的阴谋,严辞拒绝。二人见邹韬奋态度坚决,只好悻悻而归。王伯群见邹韬奋软的不吃,就暗中指使心腹爪牙写匿名信予以恐吓。邹韬奋毫不畏惧,又连写数篇文章,揭露王伯群的狰狞面目,京沪一带民众为之哗然。

1932年,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圈画出来,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并把邹韬奋的名字列入“黑名单”。

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最后一期发表了邹韬奋的言论《与读者诸君告别》,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言论上的独立精神。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我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王剑